

陈翰笙与托尼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何宛昱

【提要】 陈翰笙与托尼从分析生产关系入手认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实质,从耕地不足和工资低下等方面寻找农民普遍贫困和自我剥削的原因。托尼既承认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解决农村经济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调查而实行渐进改良,又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提出社会发展方案;陈翰笙强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对农民的剥夺,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处于社会发展转折阶段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主张以革命方式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两人从历史学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并以学术研究回答现实问题,为理解历史学家与现实的关系及史学家间的学术研究方法融合与学术见解的相互塑造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 陈翰笙 理查德·H. 托尼 农村经济问题

20 世纪初期,在从事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中外学者间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即中国的工业化远未展开,农业人口和农村经济的比重占绝对优势,中国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外学者互相征引作品、探讨问题,形成了交流活跃又十分松散的若干学术团体。^① 这个时期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大量论著为认识这种学术研究的轨迹提供了证据。有两位最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受到中国学者广泛关注,他们是托尼(R. H. Tawney, 1880 - 1962)和卜凯(J. L. Buck, 1890 - 1975)。同样,多位中国学者也受到西方学术界关注,陈翰笙(Chen Han-seng, 1897 - 2004)即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实践和著述享誉中西。有多位研究者比较陈翰笙与卜凯的农村调查方法及观点,而对于陈翰笙和托尼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方法和观点的比较尚需要进一步探讨。^② 本文仅试图比较陈翰笙和托尼对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与观念的异同,并从二人的经历及学术历程方面追

* 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项目“工合运动”研究(项目编号:UNPYSCT-2017194)的阶段性成果。

① 这批学者包括托尼、戴乐仁、卜凯、陈达、陈翰笙、曲直生、李景汉、梁漱溟、晏阳初、何廉、方显廷、陶孟和、唐启宇,等等。

② 对于托尼的研究,欧阳军喜在《中国问题与欧洲经验:托尼及其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研究》2006年第11期)一文中对托尼研究中国的巨大学术贡献进行肯定,认为他上承西方学术传统,同时又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王晋新在《英国著名史学家托尼》(《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土地与劳动》是托尼将经济与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最具分析力度的著作。彭小瑜在《“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托尼史学研究中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特点,并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中国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托尼追求的是以人的尊严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理想。刘亦明在《托尼社会批判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中,对托尼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弊端批判思想已有较为详尽的研究。黄志辉在《托尼的乡土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中认为,费孝通在青年时期的土地研究及对乡土重建路径的探讨,都是为回应托尼设计的中国复兴方案。对于陈翰笙经济史观念的研究,叶世昌和苗新宇在《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中指出,陈翰笙说明了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郑京辉和李静体在《陈翰笙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保定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中指出,陈翰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先驱,为这一学科创建了正确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核心。

溯差异的根源,进而讨论史家的学术实践与社会现实间的交互作用。对于陈翰笙与托尼研究方法 with 观念的比较,也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上半期中西方学者学术观点的交流与研究方法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

一、将陈翰笙与托尼的学术观点与方法进行比较的可能性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无论是基于欧洲经验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学者们都已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它牵涉到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农村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涉及小农、商品、雇佣劳动、原始市场等经济范畴,农民在人口上占多数,产业化发展使得农村要为工业提供所必需的工资劳动者,考察工业劳动者的前提是考察农民的生活情况。陈翰笙和托尼对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代表 20 世纪上半期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两种路径,简言之,即革命与改良。陈翰笙对中国农村经济危机进行揭示并直言需要对之予以彻底解决,其革命指向不言自明。托尼对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深具洞察力,认为农民的反抗不可避免,但他把改良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并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提出一套社会变革建议。

(一) 二人具有相近的学术旨趣与共同的学术平台

陈翰笙与托尼两人从思想到个人生活本是千差万别。但是,如果从知识分子与社会互动角度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二人在学术与社会实践方面的近似性。一方面,二人均在经济史研究基础上关注社会问题并贡献杰出著作;另一方面,二人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以各自的方式投身于解决社会问题以改变现实的实践中。

来中国前,托尼已成为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杰出经济史家,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实现社会平等,是一位具有鲜明特点的知识分子。^① 托尼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受到瞩目,来中国前已出版的著作包括《16 世纪土地问题》(*The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2)、《贪婪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921)、《英国劳工运动》(*The British Labor Movement*, 1925)、《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平等》(*Equality*, 1931)等。^② 他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兴起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和社会问题并对之进行批判性研究。^③ 以英国资本主义兴起问题为契机,他将研究领域扩展至中国土地问题、英国 17 世纪政治史问题和美国劳工史问题。托尼观察中国的视野是宏阔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比较中国和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真正的比较不是中国和欧洲任何一国的比较,而是中国与整个欧洲的比较,这种比较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组织。”^④ 此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愈益细化,

① 托尼 1880 年出生于加尔各答,父亲是位东方学者,曾在印度教育处任职。托尼先在格拉比学校就学,后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接受良好教育。托尼关注英国社会现实问题,1903 年离开牛津后即在伦敦东区教学和社会中心工作,于 1905 年加入英国工人教育协会,致力于对工人的教育运动。1906 年加入费边社,1909 年加入英国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曾参军。1921 年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1922 年两度竞选议员席位,但未成功。20 世纪 20 年代和二战后一段时期,托尼是工党的主要领导者。

② R. H. Tawney, J. M. Winter, "A Bibliography of the Published Writings of R. H. Tawne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5, No. 1 (Feb., 1972), pp. 137 - 153.

③ Bruce Baum, "Governing 'Democratic Equality': Mill, Tawney, and Liberal Democratic Governmentalit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5, Iss. 4, (Dec., 2012), pp. 714 - 731.

④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安佳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7 页。

却大体遵循了托尼提出的中西比较的框架。

陈翰笙是一位学者和革命者,^①他同托尼相近,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两个方面都有所作为,并以现实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陈翰笙自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1927年流亡苏联,1928年回国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1929年开始带领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广泛的中国农村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完成了《亩的差异》(1929)、《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1929)、《难民的东北流亡》(1930)、《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1930)、《中国的田地问题》(1930)、《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1934)等论著。陈翰笙及参与中国农村调查的青年们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以社会调查方法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

托尼和陈翰笙进行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并获得广泛关注,都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相关。1930年,托尼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主持者康德利夫(John B. Condliffe)的邀请来到上海,利用南开大学何廉和方显廷等人搜集的材料完成了《中国农业与工业备忘录》。^②1931年11月,托尼将其提交给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1932年,他对这份备忘录进行补充并整理出版,即《中国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r in China*)。这部著作援引了当时大量中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成果,其观点至今仍然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③陈翰笙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重视是在1933年学会的年会上,他提交的论文题为《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著作。^④

二人的学术交集发生于1936年陈翰笙到太平洋国际学会任职之后。1937年,托尼为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1936)撰写书评。托尼认为陈翰笙著作的价值在于对广东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是一项深入而可靠的研究,也是任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都不应忽视的。同时,托尼肯定了陈翰笙以学术研究寻求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路径。“学术超然无疑是有其优点的,但毕竟,社会研究应当采取行动。”^⑤陈翰笙在这部著作的引言中认为托尼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今天的中国问题和印度问题,并不像R. H. 陶尼教授在其《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一书(伦敦,1932年,第78—79页)中所暗示的那样与工业化以前的英国和法国存在的问题相似。”^⑥陈翰笙认为中国和印度都不能像英国那样通过国内的渐进改良实现生产关系变革,这两个国家作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所面临的情形更复杂。

1938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陈翰笙和“中国农村派”一些成员如孙晓村、王寅生等共同主编的英文版论文集《中国农村》得以出版。^⑦托尼和太平洋学会的总干事霍兰德(W. L. Holland)分别为这部著作撰写前言和导言,他们都认为传统的汉学研究对于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是不够的,中国农村派的研究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农村的现实;中国将继续在人类历史中发挥重要

① 陈翰笙189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15年赴美留学,先后就学于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1924年回国任教于北大,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后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

② 托尼访华的详细过程见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196页。

③ Adam B. Seligman, “R. H. Tawney and Scholarship”, *Society*, Sep/Oct 1998, pp. 59—65.

④ Elizabeth Green, “The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 Survey”, *Pacific Affairs*, Vol. 6, Conference Supplement (Oct., 1933), pp. 439—476.

⑤ R. H. Tawney, “Review”, *Pacific Affairs*, Vol. 10, No. 3 (Sep., 1937), pp. 344—346.

⑥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⑦ Chen Han-seng,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Kelly & Walsh, 1938.

作用,而中国的文明正是建立在农村经济之上。这部文集使人们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解释自己的社会危机。托尼接受了文集中对于中国农村耕地碎分与耕地集中并存、高利贷横行、手工业衰落、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等状况的分析。他提出如何解决农村危机成为衡量一个政府的标准:“如果一个政府允许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所描述的规模上剥削大量的同胞,它正在挖掘自己的坟墓。一个敢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政府,无论是对外国帝国主义,还是对国内动乱,都没有什么可怕的。”^①中国学者以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农村阶级分析,最终形成的论文集可以在美国出版,并受到托尼和其他书评人的肯定,这是中西学术观念交流的生动例证。

1948年6月,陈翰笙在《中国的土地改革》一文中再次提及托尼为《中国农村》写作的引言中的观点。“十年前陶尼教授(Pro. R. Tawney)写道:‘地租法须要改革,高利剥削者和经纪人紧紧地抓住死扣子不肯松手,要打破他们的势力,只希望用技术改进的方法是不行的……’”^②陈翰笙引用托尼的观点来证明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二) 陈翰笙与托尼的学术研究方法与基本分析概念异同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经济问题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预设是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工业化的社会,英国的历史经验在于农村的生产关系变革和资本积累是工业化的前提。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工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革是工业化的前提。研究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组织、生产方式、土地租佃、资本流通等问题,既可以认识工业化过程,又可以为前工业化的社会寻找发展路径。托尼和陈翰笙都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认识中国社会,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二人都注重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同之处在于陈翰笙以“封建”、“半封建”概念探讨中国社会形态,以阶级分析法分析农村社会结构。托尼的出发点是寻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新路径,即中国如果想要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如何从欧洲吸取经验而避免欧洲路径中的陷阱。他在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进行分析的同时,否认中国农村存在欧洲那种以大地产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分化。“地主和佃农都是商业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并不是分属于特权阶级的不同的双方。”^③

此时,经济史和农业史已经成为两个互有重合的史学研究范畴。托尼在1933年对布洛赫《法国农村史》(1931)的评论中,认为经济史中的农业史(agrarian history)研究应当学习布洛赫的方法,即注重比较不同区域的农业差异,并掌握气候、土壤等知识。^④托尼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也从自然状况等因素出发,他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认识有一个层次分明的框架:第一个层次是中国与欧洲的历史发展路径之比较;第二个层次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之追问;第三个层次是对于普通的个体的发展之关注。三个层次始终相互观照,融合为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视角。

托尼认为不同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路径往往十分相似,所以中国能够从西方学习诸多经验和教训。在托尼看来,中西之间在客观物质环境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农村的环境、农民生活状况、农耕技术等,中西间的差异更多集中于文化方面。中国与西方虽然使用同样的政治术语,但背后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以至于不能简单将欧洲的社会发展经验运用于中国,必须进行切实调查。

① Chen Han-seng,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1938, p. 8.

② 陈翰笙《中国的土地改革》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③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62页。

④ R. H. Tawney, “Review”,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 No. 2 (Apr., 1933), pp. 230-233.

陈翰笙在《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1930)一文中对日本、西欧、东欧、俄国的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的特征进行总结,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提供坐标。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1947)中提出,欧洲的封建经济,已经得到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而中国传统经济的历史特质,还在争辩当中。^①他认为1933年至1937年中国学者对于农村经济的研究及论战触及研究中国经济实质的方法。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其他成员注重以阶级分析法研究农村社会结构,以生产关系、地租、资本流通的分析为核心分析社会形态,是当时中国学者认识中国经济实质的途径之一:“他们相互的辩驳,不仅把理论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论上,拓展到了规定一个社会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农、就商品、就雇佣劳动、就原始市场等特定经济范畴,予以深入的探究。”^②

陈翰笙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农民进行分类,并指出对土地的占有是农村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他对农民的分类是实事求是的,不按照土地占有面积的大小,而考虑不同地区实际的生产情况及其特点,土地占有结合生活的实际状况进行分类。按照生活水平,他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又指出,中国农村中存在享有特权的地主,还有在外地主。“中国田赋在名义上是累进的,而实际是反累进的。许多有势力的在外地主,从不纳税,而这种负担大都加在当地的贫农身上。”^③由于托尼不认为在农村内部有显著的阶级差异,所以他提出由政府主导的渐进性改良措施,而陈翰笙提出进行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这是两位史学家最显著的差异。

二、对中国农村经济本质的认识

(一) 积累不足的非资本主义社会

陈翰笙和托尼都判定,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是非资本主义社会。陈翰笙的判定标准是“生产的内容与条件”。^④这些生产内容包括作物的性质、工具、肥料、劳动力的强度等。劳动力在总的生产成本中占的百分比也是重要标志。“中国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形式,仍是为简单的商品生产而耕作的形式。”^⑤它也不是纯粹封建主义的,只能被归为一种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制度。它存在商品化的农业发展,地租、税收、价格和利息等相互作用,但却不能顺利实现资本积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因为土地碎分和土地集中并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和贫农无法实现积累。

托尼判定农村社会形态的方法是将欧洲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对比,从耕作方法、农产品出售、借贷、土地租佃、动荡的社会及饥馑等方面概括农民生活的状况。中国农业不能像欧洲一样实行产业化,农民没有利用科学方法耕种和改良土地的机会,大量依靠人力劳动而非畜力,农业资金周转周期长,农民只能忍受高利贷的盘剥。农民以自身及其家庭面对有组织的商人们而丧失对农作物的定价权,商人们“在做买卖的名义下所做的很多事情,似乎就是垄断市场和囤积居奇”。^⑥常

①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1页。

②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第20页。

③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第87页。

④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第4页。

⑤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第4页。

⑥ 理查德·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55页。

年各种战乱饥馑使农民只有最低的生存需求。托尼强调农民耕地的不足导致贫困,“中国农村有40%—50%的农户,其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并不足以给全家提供食物”。^①他从中国人口众多而耕地面积相对较少解释耕地不足。上述中国农村的特征都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性质。

陈翰笙和托尼均承认存在着农村生产的凋敝和经济的危机,危机的根源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包括耕种工具落后、耕畜少、田地碎分现象严重、田价高、田租高、农民缺少改良耕地的资本、高利贷的盘剥、商业资本对农产品定价权的垄断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无法实现财富积累并扩大生产。而城市的资本也不能在农村中用于改进农业生产。耕地不足和工业化的不充分使得农民无法利用剩余劳动力,这反而使得农民陷入贫困,为了在贫困状态中生存下去,农民只能进行自我剥削。这种现象在广东十分突出,陈翰笙在广东进行的调查即揭露了农村的困境。“劳动力在广东这样的低廉,这样的不值钱;可是,全省可耕而未耕的地还要占到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有可耕的土地而不耕;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的货币资本而不能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田租、捐税、利息的负担与生产力的背驰,充分地表现着这个矛盾正在演进。”^②

陈翰笙与托尼都关注农民的自我剥削,托尼认为中国的农民属于有产的无产阶级,年复一年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之所以免于饿死,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令人敬佩的创造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部分是因为中国家族中的共产主义,部分则是因为他们减少了自己的必要消费,并耗尽了自身体能资本。”^③贫穷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主要关注的事情,不是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大的回报,而是把有限的且不可增加的资源,尽最大可能分配给更多的人”。^④耕畜的缺少是中国农耕的特点,这加剧了农民的自我剥削,“有些工作在世界各地都由牲口担负,但在中国,这类工作却要由农民或其家属本人来做”。^⑤陈翰笙也认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不是谋求利润,而是维持生存,为此能够忍受沉重的捐税和高强度的劳动。“农民因为饥荒似地缺乏耕地,常常被逼着用种种方法去佃进几亩,以维持他们的生活。”^⑥

(二) 中国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分析

陈翰笙认为,农村生产关系中耕地的占有和使用是最重要的,中国不同区域的耕地占用和使用情况不同,但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土地分配不均和耕地分散问题。对土地分配问题进行认识需要根据农户的类别进行,对农户进行分类需要基于富力并参照雇佣关系。耕地所有和耕地使用的矛盾是农村危机的重要原因。

陈翰笙认为,中国农村中的不同阶级间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农民和地主对于土地所拥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这可以说是土地的所有与土地的使用的不协调,是私人所有与公共需要的不协调:耕种者没有足够的土地以维持生计……大部分土地归那些不事耕作的人所有。”^⑦

①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72页。

② 陈翰笙《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第124页。

③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74页。

④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43页。

⑤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43页。

⑥ 陈翰笙《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第103页。

⑦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第21页。

正是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导致贫苦的农民耕地不足,耕地不足和耕地碎分现象并存,“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耕种单位的平均规模都小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①

工资低下是农民贫困的隐性原因。陈翰笙以美种烟草种植为例,说明“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是以牺牲工资来维持的”。^②烟草种植所需要的超额劳动数量,被以各种方式转嫁到老幼妇孺身上,却得不到报酬。陈翰笙以此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网络进行揭露,指出在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地主—高利贷者的相互勾结中,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在广东进行的调查,说明“土地所有权的迅速集中和由此而来的工人的无产阶级化,以及每户耕地面积的缩小,引起了失业农民人数的增加和农业工资的下降”。^③而农民依靠工资是无力购置土地的,“虽然长工由地主提供食宿,但他一年的现金收入却低于一亩中等田地的价格”。^④

农民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对于贫穷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贫农的耕畜、农具、肥料,都被剥夺了,他们只有放弃他们的小块土地——主要的生产工具……贫农及雇农比中农丧失土地更为迅速”。^⑤1929年至1933年,土地价格走低,但是荒地面积日益增加,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土地集中于新的有势力的大地主手中。

相较于托尼,陈翰笙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资本主义市场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有更充分的认识。1929年,陈翰笙利用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⑥1922—1923年对黑龙江流域的农业数据写成《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说明在东北地区农业的改善不仅是耕地的开垦,而且是更为复杂的生产关系的改进。“现在中国的所谓田租,不单是田租,还包含着—部分农业的红利,甚至—部分工资。”^⑦最能操纵农村经济的是田价、粮价、捐税和高利贷。“除掉人口税捐与粮价对于工资有密切关系外,田租能够支配农民的工资。因为田租与工资都是农业成本中的要素,要维持成本则田租与工资的增减必成反比例。不是田租涨工资跌便是工资涨田租跌。”^⑧田价高涨使农民所得的工资低落,“田价愈涨则不但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愈低,即自耕农与—部分地主所能投入生产的资本亦愈少,无论农户大小愈没有希望改良他们的农耕技术”。^⑨

托尼承认存在土地的细分和碎分,并认为这是“资源和人口二者相互关系的自然结果”。^⑩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其核心问题是价格、信贷和租佃关系,这三者对于中国农民的祸害程度依次递减。在土地租佃问题上,中国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即北方、南方和长城之外的满洲和蒙古。可以依据缴纳地租的形式将农民分为永年租佃者和随意租种土地的佃农。“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土地的所有者有别于土地耕作者,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以及共同政策的独立群体。”^⑪只有在外地主是例外。

托尼认为,中国农村经济是小农经济,农民的身份以自耕农和佃农占多数,大农田所有者人数

①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第19页。

② 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③ 陈翰笙《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第104页。

④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第107页。

⑤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第92页。

⑥ 东省铁路调查局主持调查者是西诺夫,其调查结果收入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农业》,1928年四月出版。

⑦ 陈翰笙《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第51页。

⑧ 陈翰笙《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第51页。

⑨ 陈翰笙《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第52页。

⑩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39页。

⑪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68页。

少,区分农民的身份必须考虑各个区域的文化差异,农民所占有的耕地面积与其所处省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离大城市较近的地区,往往土地流入在外地主手中,农民中的佃农数量为多。土地所有权十分复杂,田面权和田底权的情况随区域不同而有差异,对农民身份的简单区分不可取。托尼也注意到在外地主的出现,他把这种现象归于农村和城市间的经济关系。“在外地主并不居住在土地所在地的乡村,他们与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关系。”^①因为产业的不发达以及农作物商品化的程度低,托尼并不重视农民的工资问题。“在所有小农经营耕作的国家里,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工资收入问题,而是借贷问题。”^②

(三) 资本运作与土地权的外流

托尼认为,金融资本如果能够在农村进行有效流动,将改善农民的生活,使其能够顺利度过较长的农业生产周期,并使得农民有机会改善生产技术。但实际状况却是,“对比较贫穷的农民而言,长期负债是一条铁律,并没有例外”。^③ 贫穷的农民为了生存,常年典当和借贷,已经是生存的常态。金融资本以谋利为目标,以高利贷形式在农村谋取高额利息,在利息没有保障的时候,金融资本以田地为目标,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过程。这种资本运作在距离城市较近的乡村中更为盛行,因为这类乡村的手工业更难以应对工业化的冲击,乡村手工业的崩溃加速农民对于商品和货币的需求,进而更容易跌入高利贷的罗网。^④

陈翰笙以调查说明工业资本与农村发展间的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控制的商业资本会促使农民的烟草生产完全依赖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农民受到高利贷和烟草生产商人的双重剥削,进而生活水平下降。粮价的涨落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相关,雇农和雇主都受制于不稳定的币值变动趋势。捐税的繁重已是中国农业的特点。农业资本愈少则高利贷愈容易发展,高利贷将农民和商人都纳入其中,迫使商人高价卖粮,而农民低价卖粮。在外地主热衷于买卖田地的投机事业,这种现象越发达,则地价随之高涨,租价随之上升,工价随之低落,高利贷越发盛行。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是必要的,是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和发展的保证,农民可以利用资本改进耕作技术,但是,一旦资本被高利贷者或者外在地主等势力所操纵,利用资本对农业土地进行投机并控制粮价,资本也会成为贻害农业生产和压迫农民的利器。1930年,陈翰笙进一步将商业资本、封建因素和帝国主义因素并列,认为三重因素的共同剥削导致了中国的田地问题。

陈翰笙与托尼对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观点明显不同。陈翰笙强调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半封建性,地价、粮价、捐税和高利贷是最能操作农村经济的因素,田租和工资是农业成本中的要素,农村社会结构分明,阶级分化明显。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和半封建的官商相互结合,反而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托尼认为中国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但还是具有进行改良的可能。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价格、信贷和租佃关系,中国不存在欧洲式的拥有特权和大片土地的封建主。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分化不明显。在外地主的存在所体现的是城市和乡村的金融关系。当托尼把探究的目光锁定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他看到了很多重要的现象;但是在探究农村危机及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源时,陈翰笙对中国农村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进行剖析,并与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运作相互联系,充分说明

①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68页。

②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56页。

③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61页。

④ 费孝通在《农村土地权的外流》一文中,对托尼的观点有所讨论,认为托尼没能认识到农村土地权外流的根本原因是农村金融的凋敝,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34—141页。

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与托尼相比,无疑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同时应当看到,陈翰笙和托尼观点的差异不影响方法的相互融合和基本概念的某种通约性。在方法上,他们都强调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和实地调查的重要性。社会性质和生产关系密切相关,要认识生产关系的实质,就必须获得可靠的数据。这类数据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农民实际收入、田价、工资、赋税等。在基本概念方面,他们均使用“封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类概念分析中国社会,并且默认地租、田价、工资、产业化等经济学一般概念和一般原理适用于中国社会。这种学术方法和概念的融合为他们提供了进行学术沟通的工具。

三、对中国农村发展路径的探寻

(一) 解决农村危机的改良和革命两种方案

托尼和陈翰笙都承认,只能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寻求出路。“救国之策不可能从西方进口,就算西方有救国之策,它也并非是贸易物品。救国之策必须产生于中国本土。”^①他们提出了两种方案,托尼主张借鉴西方经验进行社会改良,陈翰笙主张以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在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工业建设。

托尼认为,决定农业人口生活标准的应该是人均产量,而不是每一亩地的平均产量。繁荣应该是“人”的繁荣,而不是“土地”的繁荣。中国的农业是资本不足和人力过剩同时并存的农业。农业耕种投入大量劳动力,亩产量高而人均产量低。粗放农业和集约农业两者是竞争关系,只要前者可行,后者就要被推迟。意大利和荷兰首先进行农业技术改革,是因为这两个区域首先感受到人口增长对于土地的压力。中国同样存在这种压力,却不是集约耕作,集约耕作的特点包括劳动力的密集使用、辅助劳动力的农业器具密集使用、充分利用科学成果辅助农业这三个方面,中国农业耕种仅符合第一点。托尼将农业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低廉的运费、科学和教育以及农业合作运动。相对应的,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包括:交通、科学和教育、信贷合作和销售合作、分散的农田集合成大农场。托尼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给其他研究者带来重要的启发,斯科特承接其观点,指出土地和劳动力(即自然和人力)之转化为商品,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村民们越来越失去对土地的控制,耕种者逐渐失去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权而变为承租人或农业工资劳动者,农业产品的价值越来越受非人格化的市场波动的影响。^②这些意见对于今日的中国农村的建设仍有启示意义,但是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未能提供进行变革的环境。

在托尼看来,农民生存情况的恶劣已经使得公开的反抗顺理成章:“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所谓共产党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土地问题,或者是因为没有出路而激发出来的盗匪问题。”^③托尼并未认识到,中国所开展的土地革命及其所激发出的巨大民族情感将铸造中国的现代国家意识。“农民进行土地斗争的现象,在所有国家,即凡是佃农必须把他的绝大部分收成缴纳给在外地主的国家,都是相同的。中国与别国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农民的土地斗争较任何国家都更难以避免。”^④托尼未

①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200页。

②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③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76页。

④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101页。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已经不同于西方古老的农民起义,必然彻底重新建构社会秩序,改变生产关系。他将革命领导者归为政治传教士:“政治传教士们已经针对难以容忍的不公平状态,自然而然地组织起了反抗斗争,并为自己的反抗加上了一抹明亮的理论色彩。”^①他未能认识到符合普遍的大多数的农民诉求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相互融合,将成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中的根本推动力量。但是,如果考虑到英国历史发展中渐进性改革的经验,我们能理解托尼的视角和观点。

陈翰笙认为解决土地占有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一场革命。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战争会重塑整个国家,健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度会推动中国的重建和新生。中国人民通过战争得到独立、自主和自由。战争给中国农村和工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内容。“中国的农民,在民族独立战争中,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了。农民的致力抗战,除了为求民族的独立解放外,同时也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合作运动由信贷合作社转向以生产为基础的合作社,通常是手工业与半机械化的联合,有可能以合作社取代分散的个体的家庭生产。农业生产中初步的农业集体经营也有希望实现。他认为游击区和新兴民主政权的土地重新分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游击区有些地主固然早已逃避到沦陷的都市中去了。大多数的地主却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民族统一战线。这里汉奸们的田产早已分给了农民,有些地主并且还自动的折让租额。”“新兴的民主政权,确是改善农村经济的唯一途径。这里的农民自己武装,有自卫的能力,有政治的地位。而他们的政策,也就易于决,易于行了。”^②

(二) 寻求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托尼以欧洲的视角和经验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观察,虽然与革命潮流相抵牾,但是其观点有独特之处,欲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的发展,必须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托尼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有深刻的认识。“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尽管土地和气候具有天然的优渥条件,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多数国家的社会问题就是今天中国和印度的社会问题。”^③欧洲国家的农业革新在国内方面包括立法和制度变革、技术和科学革新、商业和金融革新、国家设立农业保护政策。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兴起农村合作社,并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托尼对农业合作运动十分赞赏,欧洲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是可行的。“对于希望改善农民生活的人来说,根本找不到更加可靠的事业可以像合作运动一样,能产生永久性的结果。”^④

关于合作运动,托尼的观点带有理想色彩。他认为建立较好的信贷制度和销售制度,可以避免农产品生产者被放债人和农产品经销商摆布。托尼指出,最终能产生出最大效果的政策措施,是能够创造一些习惯和制度,这些习惯和制度将来可以预防贫穷的发生。合作运动就意味着宣传推动、组织、监督以及教育。农业合作社的最理想状态,是建立信贷和销售机制,借款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借到手,有序的销售可以调节农产品供给之过剩与短缺。合作运动对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有重要作用。“合作运动可以把农村人口组织起来,在农村建立起了一种互相信赖的氛围、一种相互需要的意识以及一种集体行动的习惯。”^⑤由此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我们可以期待合作运动能使中国的农民与其他各国农民一样,在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公共事务中占有适当的权重,而现在,他们

①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76页。

② 陈翰笙《目前中国的农村》,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第135页。

③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82页。

④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101页。

⑤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100—101页。

似乎是被人毫无愧疚之心地牺牲掉了。”^①

陈翰笙对农村合作运动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他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通过这种渠道流入农村地区的资本带有谋利的目的,将资本投入农业耕作技术的改善所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高利贷的收益。“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性质不同。前者以增加生产及改善生产者的生活为唯一宗旨。后者以投放资金及稳取利贷为主要意念。”^②他承认由知识分子和那些真诚希望中国农民能过上更好生活的人所发起的合作运动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中国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病症使得这一运动为资本谋利提供机会。“往往有些热心合作社的青年,痛恶奸商的垄断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以为只要把生产者组成合作社,便能解决问题。但因过于崇拜形式,忽视实质,未能彻底明了农村社会关系的真相,竟于不知不觉中和地方上最腐化的分子携手起来。”合作社本身不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形态,它是一种经济工具。陈翰笙对以生产为主的工业合作社持支持态度,并投身工合运动。“工业合作社已成为我国生产合作社的骨干。它虽救济流亡,却不是单纯的慈善机关。它虽然有工厂和作坊,组织上却完全是民主的。”^③

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同时并进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在工业发展前景方面,托尼提及中国工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内部的战争、破败的交通、资本稀缺、不安定的环境等因素,外部的威胁包括铁路的四分之一以上、铁矿的四分之三以上、煤矿和纺织厂的二分之一,以及榨油厂、面粉厂、烟草制造厂、汽车厂、银行等,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城市既畏惧农村又看不起农村,乡村既猜疑城市也讨厌城市。内陆中国和东部沿海的中国,事实上是两个分离开的有机体。中国的工业偏于东部沿海;很少越过海港河口腹地冒险进入危险的内陆省份。这样一种非自然的束缚经济的态势,扭曲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本来应该用于开拓未开发地区资源的资本,反而被固定使用在几个大城市。托尼认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看法,从经济角度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社会需要向工业社会迈进,近代工业是一种社会产物,它的基础既是物质的,也是心理的,部分依靠必要的自然资源,部分依靠科学知识,部分依靠能够使这种科学得到应用以及能够使这些自然资源得以开发利用的习俗和制度。中国接受工业文明,是一个适应和调整的问题。“资本主义工业进入中国,要么转变为一种完全中国式的东西,要么就完全不能适应中国的环境,二者必居其一。”^④

陈翰笙在工业化方面的看法与托尼十分相近。“整个工业化的政策绝不能忽视历史的继续性,不能忽视工业的社会性,也就不能忽视那些辅助工厂工业的手工业。”要建成工业社会就需要进行系统的社会建设。可用的机器和可用的人才同样是重要的。“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技术会计和经理人才,都要靠一个革新的教育制度,来训练和陶育。”^⑤新教育与只重功名的旧教育是完全相反的。

陈翰笙和托尼关注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无论是否以革命方式进行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这类一般性问题都不能回避。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是并行的,是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相互交汇的内容,仍然是以什么方式实现人的发展的问题,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关键的作用,这种关注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①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101页。

② 陈翰笙《合作运动与农村机构》,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第124—125页。

③ 陈翰笙《合作运动与农村机构》,第125页。

④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142页。

⑤ 陈翰笙《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425页。

四、两种农村经济发展路径方案的根源

美国历史学家小巴林顿·摩尔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序言中写道:中国现阶段还没有出现自己的马克·布洛赫或乔治·勒费弗尔,根据档案进行仔细的研究,来阐明在旧秩序崩溃和新秩序出现之前后农民的实际情况。^① 历史学家认识社会的可能性和方法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在不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杰出历史学家是如何进行研究的,他的学术实践选择和方法选择的可能性又是什么。^② 托尼和陈翰笙的个人经历和学术研究历程与各自生活的社会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一) 以英国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方案

托尼和陈翰笙提供了两条社会发展路径,同时也提供了20世纪上半期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两种可能选择。当然,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境遇,每个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都是理解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鲜活样本。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时代皆具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20世纪上半期时代精神之一种,即是知识分子要发挥特定的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以学术研究回应社会现实问题。陈翰笙和托尼原本远隔万里,却相遇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领域,使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比较他们的经历与观点来理解20世纪上半期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和发挥社会职能间的关系。

托尼在英国经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对英国16世纪的农村问题、乡绅入侵与英国内战的关系、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20世纪中国的土地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有所创见。托尼被视为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者,或者称为“道德经济学家”。^③ 托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对英国工党内部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论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未能从道德而仅从物质生产和分配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因而不够彻底。^④ 托尼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者,他上承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承认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只有通过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才能促成人的平等,因此他毕生致力于工人教育运动,并呼吁建立公平的社会教育体系。

托尼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基督教道德观与学术研究相互融合,并以此为支点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物化,强调人生而为人的独特价值。他又被视为一个调和主义者,试图调和现实的不平等与西方政治理念中的平等观念,调和的途径就是强调教育的社会职能并为创造公平教育机会而奋斗。

教育问题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托尼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所谓的教育,只是帮助少数个人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的阶梯,迄今为止并没有成为提高普通大众的知识素养和社会福祉的工具。”^⑤ “这些大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人好好接受过教育,但人人都能毕业。”

①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导言,第4页。

② 1931年马克·布洛赫已经出版《法国农村史》,并于1939年出版了《封建社会》。在前一部著作中,布洛赫谈了农村史研究的方法和资料问题:“历史学家永远是自己的文献资料的奴隶;尤其是献身于农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发掘新的可用的史料进行农村史研究,“尤其是那些法庭诉讼的证明,那些判决,那些法律条文”。参见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导言,第7页。乔治·勒费弗尔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有深入研究,完成《法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1924)、《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1932)等,善于利用统计数据分析农民问题,从农民的视角审视大革命。

③ Jon Crudda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ed for a Mor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Renewal: a Journal of Labour Politics*, Vol. 26, Iss. 3, (2018), pp. 45–49.

④ Adam B. Seligman. “R. H. Tawney and Scholarship”, pp. 59–65.

⑤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201页。

“不能让教师为了让学生能够通过考试而教学,而要让他们为了学生能够思考而教学。”^①这些批评不仅切中时弊,而且触及教育的本质问题,即教育是对人的塑造而非其他。

但是,也必须看到,托尼所追求的“可能的教育平等”即使在英国也未能实现,争取教育平等的权利对于托尼而言是达成一个理想社会状态的重要途径。托尼理想中的良好的社会状态是这样的:良好的社会状态依赖于凝聚和团结,它意味着生存不仅意味着向上提升地位,还有较高水平的大众文化,和对公共利益的重视,以及一种贯彻始终的信念,即文明化不仅是社会精英的职责,还是一项公共事业。个人的快乐不仅需要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升,还需要他们能够引导一种高尚又有文化内涵的生活。^②托尼以这种对良好社会追求的信念为道德原则指引自己的实践。这种社会状态距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何其遥远,基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和基督教道德的社会发展方案不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

一个国家虽然可以从国外引入某种工具,但掌握这种工具所需要的力量,一定深藏于自身。如果能够解决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关系问题,辅之以适合中国现实的教育体系,建立工业体系,那么,农业问题将得到较好的解决。

托尼看待中国问题,就像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是希望中国能够避免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错误,寻求一条理想的工业化道路。^③作为经济史学家,托尼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和研究,他的视角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双重维度,对经济问题的审视在这双重维度中进行。欧洲史家中不乏如托尼一样投入政治斗争以为某些群体谋求社会公平者,也有挺身而出反抗纳粹献身战场的斗士。时代使然,历史学家必须有所行动。

(二) 以中国革命经验为基础的路径探寻

陈翰笙具有三重身份,是学者、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与托尼不同,他是一个隐秘的革命者。他在美国和德国接受史学训练,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学习。他亲历“三·一八”惨案,在枪林弹雨和北洋军阀政府对进步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中,认识到以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他曾赴上海发动租界的印度巡捕罢工,但未成事。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乱中的选择余地并不大,能在学术研究和推动社会发展间寻求联系更为难得。陈翰笙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地为共产国际工作,为其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写文章介绍中国现实情况。李大钊被捕后他被迫流亡苏联,正是在同苏联的中国专家讨论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他意识到无论中国知识分子还是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均缺乏了解,这成为他进行中国农村调查的契机。^④

① 理查德·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205页。

② Richard H. Tawney, *Equality*, Unwin Books, p. 108.

③ Margherita Zanasi, “Western Utopias, Miss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Chinese Villag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4, Iss. 2, (Jun 2013).

④ 陈翰笙的革命工作经历较为详细和完整地记录在《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的《陈翰笙同志谈〈地下工作二十五年〉》一文中,该文由陈洪进整理,整理时间是1984年3月至11月。文中较为详细地梳理了陈翰笙从事地下工作的线索:1924年在北京大学教外国历史时遇到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里涅维奇并研读《资本论》;1924年认识李大钊并开始为第三国际工作;1925年奉李大钊之命去上海发动印度巡捕罢工;1926年与蔡和森畅谈一晚,开始重视中国农村研究;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陈翰笙流亡苏联并进入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1927年在苏联结识宋庆龄、邓演达等人;1928年回上海并逐渐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佐尔格等共同完成第三国际任务;1929年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进行农村调查;1931年参与营救牛兰夫妇;1933年杨杏佛遇刺身亡后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工作,赴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1934年去东京协助佐尔格工作;1935年由于接头人身份暴露流亡苏联;1936年赴美国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人员及《太平洋事务》编辑;1939年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合运动,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赴桂林继续工合运动;1944年流亡印度;1946年按照周恩来和廖承志的指示从印度到美国,一直到1950年回国。参见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299页。

在纷繁复杂的学术争论和社会实践中,科学性和实践性逐渐成为重要的理论检验标准。十月革命的精神和路径成为鼓舞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例证。陈翰笙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最关注的是实践问题,学术研究围绕社会现实问题,寻求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应当是现实可行的。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不仅为达成科学研究的目的,更是为回答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个最重要的时代之问。陈翰笙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系副所长为公开合法的身份,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农村调查。通过在保定、无锡等地的调查,陈翰笙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社会”。^① 田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种合并起来,以农民为剥削的共同的目标。

陈翰笙和托尼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截然不同,托尼以欧洲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社会,而陈翰笙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认识中国社会。陈翰笙指出:“在古代奴隶社会,劳役者只有田奴还没有佃农,田主是人力与地力的剥夺者。到封建社会时代,就有佃农发现,田地也变成商品化。及进至资本主义社会时代,不但有佃农,且有雇农;田地不但商品化,且变为一种富有剥削的资本。”^② 陈翰笙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陈翰笙较之托尼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现实的方法,也是有力的思想武器。两人均以学者身份介入社会现实,但是所面临的社会活动空间及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却截然不同,进而提出迥然相异的社会发展路径。

国弱民穷并遭受侵略的现实使得所有的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迫切寻找解决路径。陈翰笙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更全面,廓清农村生产关系遭受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影响,阐释中国在帝国主义经济网络中的地位问题。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半封建的、官僚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只能以革命的方式,陈翰笙希望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在革命完成之后考虑工业化和教育问题。

结 语

托尼和陈翰笙都记录了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社会现象和农民受贫穷之苦的惨状,并剖析生产关系的实质,提出解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两种方案。托尼从中国农业自身发展受到传统农耕技术的制约和中国的人口与土地耕种面积间的不平衡等方面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源,并指出乡村和城市间存在的金融关系,资本在村庄中以高利贷等方式牟利,在农村经济破产中转向投资土地,进而出现在外地主,加剧农村经济危机。

陈翰笙则强调农村耕地的碎分和地权集中的根源是地主和不同阶级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的不平等,农民耕地不足、工资低下是农民贫困的根源,不同阶级的农民在承受高利贷和城市资本的剥削中具有不同的承受能力,愈贫穷的农民愈容易失去土地而经济条件愈恶化。帝国主义的工业资本的兴起使农民在经济作物生产中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结成剥夺农民的联盟,以农产品生产和收购、高利贷等方式实现资本的牟利。这种困局堵住改良的途径,只能进行彻底的革命实现生产关系变革。

^① 陈翰笙《中国田地问题》,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第78页。

^② 陈翰笙《中国田地问题》,第77—78页。

陈翰笙与托尼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学术观点的差别的根源首先是现实的可能性,即社会现实环境能够使其选择何种方法。陈翰笙可以进行实地调查而托尼只能引用他人调查数据,历史学家认识现实的程度受制于方法。其次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吸取不同方面的欧洲经验。陈翰笙希望人们像重视法国大革命一样思考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意义。

托尼、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的其他成员,也包括同时期其他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者的学术交流的意义,首先在于东西方学术观念的沟通,其次则在于东西方学者在认识中国社会的经济本质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塑造。这种学术研究方法、基本分析概念和研究视角的融合丰富了当时的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本质的认识。时代更变,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农村问题常变常新。但是,以人为中心,回答人的发展问题,剖析生产关系的实质,以历史的、社会的广阔视角审视经济问题,以扎实的社会调查认识社会现实问题,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加深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是陈翰笙和托尼的著作中的宝贵财富,仍值得当代人进行探究、阐释和践行。

(作者何宛昱,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邮编:100006)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张旭鹏)

《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进程。新史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作者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对历史人类学这种学科融合的新形态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全书分为“上篇 理论篇”与“下篇 实践篇”两部分,广泛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了一个历时性的系统分析,并对其后的发展趋向有所探讨。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史学思想研究》

梁艳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在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中,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认为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史学实践中,戴维斯注意把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志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并在历史书写上采取叙述史学的写作策略,成为跨学科的典范。该书通过梳理和解读戴维斯各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成果,系统分析了她在妇女史、影视史和新文化史领域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及社会影响。该书是国内研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首部专著,对于我们了解其史学思想有一定帮助。

SUMMARY OF ARTICLES

Chen Hansheng and R. H. Tawney on Rural Economy in China // *He Wanyu*

As pioneers of studying rural economy in China, both Chen Hansheng (aka. Chen Han-seng) and Richard Henry “Harry” Tawney examined the issue through analyz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ir works, they share the view that factor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low wages contributed to the widespread poverty and self-exploitation among Chinese farmers. Tawney, on the one hand, recognize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Society, admitting that to solve rural problems one needs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arry out gradual impr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he proposed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ams based on Europea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Chen Hansheng emphasized the combined impact of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on the deprivation of peasants and analyzed the change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Marxist methods. Through doing so, he advocated a revolution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both of them examine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and answer practical questions with academic research. They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scholarly research thanks to their shared concerns, which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social re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Shi*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hip: Based on 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 *Ning Tengfei*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holarly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China, *Zi* refers to works by pre-Qin philosophers, and *Shi* works by historians. *Zhu Zi Yi Shi* is an important theory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Essence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means, “all works by philosophers are also history.” This theory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in modern times. It was, on the one hand, rooted in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Shi* among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as Zhang Xuecheng and Gong Zizhen. On the other hand, it grew out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Jinwen and Guwen Schools of Classics, as reflection upon Kang Youwei’s attempt to reframe Confucius and other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n. Zhang Taiyan, Deng Shi, Liu Shippei had different ways to justify the theory, but they all agreed on *Zhu Zi Yi Shi*.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is a radicalized version of *Liu Jing Jie Shi*, which means, “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y”. The latter came from the hypothesis that all ancient philosophers (*Zhu*) originated as scribes in the royal office, and it was a revisionist view on *Zhu* thanks to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time. Scholars after that, such as Zhang Ertian, Sun Deqian, Jiang Quan, shared this view, which formed an academic consens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Zh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not on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historiography and elevated the status of the history discipline,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role of the studies on *Zhu*. It furthermore prompted the revival of this traditional discipline and provided an internal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s a historical turn in scholarly research.

Rethink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 Study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 *Deng Rui*

A result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was that historians began to study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y comparing China to the West. They restructure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s suc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ng